

言语社区理论综述*

张红燕 张迈曾

提要 本论文对不同的言语社区理论进行了综述。论文分析了以拉波夫为代表的定量范式言语社区理论和以海姆斯、勒怕热和塔布雷-凯勒为代表的定性范式言语社区理论以及以米尔罗伊夫妇、安娜和帕拉迪为代表的综合范式言语社区理论。论文同时探讨了安娜和帕拉迪言语社区区域细分理论框架。作者还探讨了埃克特和麦康奈尔-吉内的实践社区理论。作者认为在讨论言语社区时,应将言语社区成员的个人能动性和社会机制对个人身份的构建结合在一起,既强调个人主体的能动性又强调社会机制的构建作用。

关键词 言语社区; 实践社区; 个人主体; 社会构建

言语社区是社会语言学家为了联系社会进行语言研究而采用的分析工具。本论文分析了以拉波夫(Labov)为代表的定量范式言语社区理论和以海姆斯(Hymes)、勒怕热(Le Page)和塔布雷-凯勒(Tabouret-Keller)为代表的定性范式言语社区理论以及以米尔罗伊(Milroy)夫妇、安娜(Ana)和帕拉迪(Paradi)为代表的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范式言语社区理论。该论文探讨了安娜和帕拉迪言语社区区域细分理论框架。作者还进一步探讨了埃克特(Eckert)和麦康奈尔-吉内(Mc-Connel-Ginet)的实践社区理论。面对众多的言语社区理论,作者认为可以将其归纳为三大类,一类强调社会机制对个人的构建,以拉波夫为代表的定量范式言语社区理论属于该类;另一类强调个人的能动性,以海姆斯、勒怕热和塔布雷-凯勒为代表的定性范式言语社区理论属于该类。第三类既强调个人主体的能动性又强调社会机制的构建作用,以米尔罗伊夫妇为代表的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范式言语社区理论,安娜和帕拉迪言语社区区域细分理论框架,埃克特和麦康奈尔-吉内的实践社区理论属于该类。作者认为在讨论言语社区时,应将言语社区成员的个人能动性和社会机制对个人身份的构建结合在一起,既强调个人主体的能动性又强调社会机制的构建作用。

一 定量范式言语社区理论

定性范式言语社区强调社区成员言语的一致性。在同一个言语社区虽然存在许多言语变量但是言语社区成员是共享这些言语变量的。语言的一致性要求在研究言语社区时达到语言

* 本论文获得 2004 年湖北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项目编号 2004X006)资助。

层面和统计层面解释的充分性。其代表人拉波夫强调对言语社区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强调宏观层面上的实证性。宏观层面的研究强调的是言语社区对群体构建性，而不是个体的能动性。拉波夫（1972a）认为言语社区是存在于群体之中，是靠一些重要语言特征的常规评判和语言使用的变异来决定的。拉波夫言语社区的分析单位是语言变量，一种社会对变量不同的评价因素。如在英语中“-ing”是一个语言变量，它可以有软颚音和非软颚音两种语言变体，软颚音变体被言语社区的成员认为是正式的、非地方性的、有声望的语言变体，非软颚音变体被认为是非正式的、地方性的、显示出彼此的亲密关系。

拉波夫认为语言变量和社会价值之间是有关联的，他将语言变量以社会的认同程度加以区分。社会的认同程度又称“语用显著性”（pragmatic salience）。最容易被识别的是语言的约定俗成（stereotypes），第二类为语言标记，具有文体层次性和社会阶层性。语言标记具有语言地方性，但并非被人瞧不起的（stigmatized）语言变体。第三种是语言的指示性（indicator），该认同是由语言学家来认定的，在言语社区内部尚未达到成员意识认同感（Labov, 1972b: 314）。不同的语言变量与语言变化的不同阶段有关。语言变量对言语社区的成员而言不仅表现在语言使用方面，还表现在他们对这些语言变量的认同和评判上。拉波夫的言语社区由此可以定义为共同使用一组语言变量并对这组变量具有共同的评价标准的人群。

拉波夫的言语社区是为了强调语言使用和语言评价的社会功能，它并不强调个体和说话者个人能动的社会功能。拉波夫理论重点是语言的而非社会的，强调语言理论忽略社会理论，言语社区个体被贴上唯心的实在主义阶级标签。在语言操作层面，言语社区被严格的定义和局限在使用某一单个语言的某一特定的部分人群。因此拉波夫的言语社区语言场景（Language setting）过于狭窄，在语言变量操作层面上是错误的，语言变量和语言规则并没有体现言语社区内部说话者个体语言的生产性和多样性。拉波夫的言语社区不包含双语社区，排除了边缘群体这一重要组成部分。边缘群体包括双语人或语言不熟练的“半语人”（semi-speakers），例如在苏格兰北部索色兰郡有一些说盖尔语的人群，他们虽然不享有该地区语言变量社会评价的共有模式，但从文化场景的角度，他们是索色兰郡言语社区的内在组成部分，因此在言语社区中应考察个体语言熟练连续体（proficiency continuum）。拉波夫的言语社区没有探讨语言接触、移民、少数民族及小城镇的言语社区情况。克斯威尔（Kerswill, 1993: 51）在研究乡村移民到挪威的贝尔根市后发现与拉波夫言语社区中相反的例证，在该移民群体中表现为语言变体模式的非一致性、语言特征评价的非共享性、语言系统内部的非关联性。克斯威尔在1995年分析了两个男孩的言语，发现在英格兰 Reading 言语社区中，语言结构在言语社区的人群中并不象社会语言学家所设想的那样是一致的。

二 定性范式言语社区理论

定量范式的言语社区理论过分的强调了语言学理论，定性范式言语社区理论强调社会理论，该理论的研究重点不是构成言语社区中群体的总体性特征，而是言语社区中的说话者的

个体特征,研究在一个相对有限制的社区中社会对个体语言的影响。拉波夫的大规模实证统计研究与该范式相反,拉波夫试图研究大都市中语言变异的有序质性(ordered heterogeneity)。定性范式言语社区理论研究的是在一个相对地方性的、自我设计(self-designating)的社区中人们的社会交往。海姆斯、勒怕热和塔布雷-凯勒是该范式的代表人物

1 海姆斯的言语社区理论

海姆斯(1972)认为社会语言学应主要研究社会交际人群的交谈方式的各种不同的功能。海姆斯提出了“言语社区”和“语言社区”两个概念,他承认在民俗学中的“言语社区”和人类学中的“语言社区”定义界定的难度(1974: 47-51)。定性范式的“言语社区”通常被定义为在一个独立的区域中用语言资源来行事的有社会交往的一群人。语言资源在定性范式言语社区中又称语库,它比定量范式言语社区中所指的语言变量形式和类型要多。人类学中的“语言社区”包括说一种语言的所有人,这些人能意识到更为宽泛的社会常规,如说美国英语的人。在实践中,定性范式言语社区构成比定量范式言语社区构成更有约束性和限定性,而语言社区的构成涉及面更为宽泛。定性范式言语社区的目标在于研究交谈是如何创造社会意义的。拉波夫的言语社区构成是用来研究大都市地区,但是言语社区群体的自我定义的优先权被剥夺。交谈的社会意义是定性范式的言语社区理论的研究终极目标,个人的能动性在定量范式的言语社区理论中是没有受到重视的。

2 勒怕热和塔布雷-凯勒的言语社区理论

勒怕热和塔布雷-凯勒强调个体的能动性。言语社区不必先行存在,个体是言语社区存在的先决条件。说话者构建了自己的语言系统,言语行为是对社会的投射行为(acts of projection)。勒怕热和塔布雷-凯勒认为,“个体创造了自身的语言行为,这种言语行为是与言语社区的群体的语言行为相一致,在这种相似的言语行为中他希望能体现他自己的身份。为了区分自己与他人不同的身份,他的言语行为会与言语社区的群体不一致”(Le Page and Tabouret-Keller, 1985: 181)。因此,言语社区群体或群体的语言特征只存在于个体的意识中,言语社区与个体之间的行为是紧密相联的。

个体言语行为是一种投射行为,“个体投射他自己的内心世界,并下意识地要求群体分享他的内心世界;群体也从个体的语言中意识到个体的象征世界,并分享个体的象征世界”(Le Page and Tabouret-Keller, 1985: 181)。每个人为自己的言语行为创造一些系统,以便使这些系统能够与自己时时希望被确认其成员的那个或那些群体的系统相似,做到:(1)他能够识别这些群体。(2)他有机会也有能力去观察和分析这些群体的行为系统。(3)他的动机强烈得足以迫使他选择并相应地改变自己的行为。(4)他还须有能力改变自己的行为。根据这个观点,个人“在一个多维度空间里确定自己的位置”,这些维度是由他在社会中能够识别的群体所限定的,这些群体肯定是重叠的。勒怕热完全避免使用“言语集团”这一术语,他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中具有明显的语言特征及其他社会特征的群体。这些群体是说话人观察到存在的,而未必是社会学家用客观方法发现的。这些群体不必包括全民中的所有人,但可

以代表某些社会类型的明显的实例。

三 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范式言语社区理论

许多的社会语言学家将定性范式言语社区理论与定量范式言语社区理论相结合，笔者认为可以将其归为综合或互补范式言语社区理论，既强调个人主体的能动性又强调社会机制的构建作用。其代表人为米尔罗伊夫妇、伍拉德（Woolard）、安娜和帕拉迪。

1 米尔罗伊夫妇和伍拉德言语社区理论

米尔罗伊夫妇试图将定性与定量范式的言语社区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社会网络理论。他们认为紧密的社会网络关系纽带将内部彼此交往的说话者与外部自我设计群体相连接起来，疏远的社会网络关系纽带仅仅将外部群体连接起来。他们将阶级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试图用宏观层面上的社会理论展示其社会网络理论，目的在于将定性和定量范式言语社区理论结合在一起。

伍拉德（1985）认为语言思想是调节社会结构和话语形式的调节纽带，许多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话题如语言态度、语言规范、语言现实、语言威望和霸权都是存在于语言思想中。她也将定性与定量范式的言语社区理论结合起来，认为语言思想研究可以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进行研究。伍拉德发现语言思想和信仰与某一特定的社会地位的经验相一致，语言思想会出现合理化的错误，语言思想不仅可以在思想和意识领域里进行研究，而且可以在人际交往领域里进行研究。伍拉德从社会理论中创造性借鉴并最终得出她自己的理论，认为在语言与社会行为秩序中存在一定的关联，社会行为本身具有双重性质，它同时具有定性和定量的特征，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或固有的行为方式，它同时具有宏观上的规模也具有微观上的深度。

2 安娜和帕拉迪言语社区区域细分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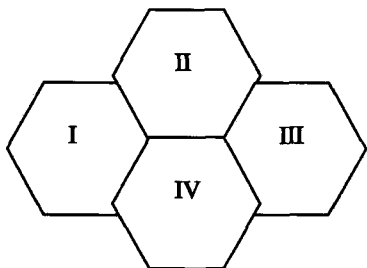


图 1: 相互排斥的言语社区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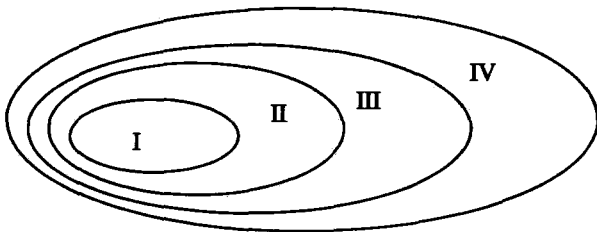


图 2: 相互内嵌的言语社区模式

安娜和帕拉迪（1998: 34）对墨西哥巴霍地区的言语社区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他们的言语社区模型。该言语社区应用拉波夫的言语社区的评价标准，既强调言语社区内部成员彼此共享的语言变量，又同时强调言语社区语言特征的社会标记性，但是这些语言特征并没有将

彼此不相容和相互排斥的 (mutually exclusive) 群体 (如图 1) 排除在语言社区之外。该言语社区是由一组相互内嵌 (embedded) 的人群组成, 该模型可以由一组同心的椭圆表示出来, 言语社区具有显著的重叠特征, 该语言社区由不同的说话个体组成的子集重叠构成, 将定性言语社区的构建和定量言语社区的构建放在同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大的集合体之中 (如图 2)。该言语社区模型基于两个标准: 语言使用的共享模式和语言评价的共享模式。言语社区的构成以显著的语言变量来确定, 语言变量同时反映了个体在社会环境中与他者不断交际而扩大的交往面。个体充分意识到自身显著的语言变量构成了不同层次的语言等级 (linguistic hierarchy), 该语言等级显示了某种社会等级和社会组织的结构特征。该模型显示了社会等级表现在有标记的语言变量的评价系统之中, 社会等级在话语方式中体现出来, 人们总是以他们的说话方式受到评价的, 但是某种特定的知识并不是被每个个体分享, 某种语言变量所体现的某种特定的知识由语言环境中的个体所处的具体位置决定的。

安娜和帕拉迪将定性与定量范式的言语社区理论结合起来形成言语社区区域细分模型, 将言语社区细分为 4 个小言语区域, 即言语社区区域 1——言语现场 (speech locale), 言语社区区域 2——言语近区 (speech vicinity), 言语社区区域 3——言语管区 (speech district), 言语社区区域 4——国家言语区 (national speech community)。言语社区的细分标准为 3 个语言变量, 即被人瞧不起的语言变量 (stigmatized variable), 特定地区语言变量 (specific regional variable) 和标准语言变量 (standard variable), 这 3 个语言变量的使用都会影响到群体在一个社会等级制中评价和定位个体的方式。在安娜和帕拉迪的言语社区模型中, 被人瞧不起的语言变量在 4 个言语社区中被广泛使用。由于同一地域的人们彼此交际并相互影响, 地方性语言变量可以同时被认为是地理和社会标记。个体对这些语言变量的认识在意识层面上是无意识的但是在实验操作上是显著的。通过这些显著性的语言变量可以将一个言语社区细分为 4 个具有代表性的小言语区域。安娜和帕拉迪的研究地点虽然是墨西哥地区, 但是可以将该模型推而广之。安娜和帕拉迪的言语社区区域细分模型如下表 1, 横列表示该言语社区的语言变量因素, 纵列表示该言语社区的细分言语区域, 用二元元素 [+/-] 来界定不同的言语社区。

表 1 安娜和帕拉迪的言语社区区域细分模型

		被人瞧不起的语言变量	地区语言变量	标准语言变量
言语社区区域 1	言语现场	—	—	—
言语社区区域 2	言语近区	+	—	—
言语社区区域 3	言语管区	+	+	—
言语社区区域 4	国家言语区	+	+	+

资料来源: Ana, O.S. and Parodi, C. 1998, pp. 23-51.

在帕拉迪言语社区中, 被人瞧不起的语言变量保留了墨西哥古西班牙语的残余词汇、音

系、语形, 这些语言残余物被认为是土气的或是没有受过教育的, 在正规学校教育中这些被人瞧不起的语言变量是受到鄙薄和抨击的, 在言语社区区域 3 和 4 中是被人瞧不起的。地区语言变量是一种区域性的墨西哥西班牙语, 墨西哥人可以通过这些语言变量来表明他们属于某一地区的当地人身份, 它们的语言特征不是被人瞧不起的, 它们是某一地方区域的个体语言标记。标准语言变量是标准化的墨西哥西班牙语, 它是学校教授并在书面语中应用的语言。

安娜和帕拉迪认为言语社区的全体成员并不共享语言变量评价的所有方面, 这点与米尔罗伊夫妇的“社会网络”概念相一致。莱斯利·米尔罗伊认为紧密的社会网络是网络中的人们“缺少社会流动性……牢固占有已经建立的社会交往领地, 并被众多亲属纽带连接在一起”(1980: 183)。“在一个极度稠密和纷繁的社会网络中, 每一个人都认识另一个人(社会网络密度), 并且个体能够以多种方式对另一个体有所了解(社会网络多样性)”(Milroy and Milroy, 1991: 5-6)。米尔罗伊夫妇认为疏远的社会网络是网络中的人在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中流动的, 在安娜和帕拉迪的言语社区区域细分模型中, 言语社区区域 1 中即言语现场中的人群是具有最为紧密最为完整的社会联系, 随着言语社区个体在巴霍地区的交往的不断扩大, 社会网络多样性却不断减少, 呈现一种逆向的反比关系。

区域 1 的成员不受位于他们网络以外的人对他们自身的说话方式的影响, 而区域 2 的成员对于外人如何看待他们语言说话方式很敏感。术语“近区”与海姆斯(1974: 52)和米尔罗伊(Milroy, 1980: 14-17)夫妇的“社区”相一致, 也与罗曼(Romaine, 1982b: 8)的“社会群体”的概念相一致。“言语近区”指的是一组紧密社会网络的家庭, 个体在该区域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一般的熟人关系, 而是彼此的生活会影响到对方的生活, 从而构成一种紧密的社会网络关系。言语管区(言语社区区域 3)中包含有大量的彼此之间不熟悉的成员, 阶级、种族、教育的差异在该言语区域中有所表现, 言语管区与拉波夫(1972b)的言语社区的概念相一致。国家言语区(言语社区区域 4)与海姆斯的“语言社区”的概念相对应。用 3 种语言变量可以细分一个言语社区, 从而得到安娜和帕拉迪言语社区区域细分模型的 4 个言语区域。言语区域 1 的成员不能区分被人瞧不起的语言变量的等级; 言语区域 2 的成员用被人瞧不起的语言变量来评价言语, 但是没有意识到言语变量的地区模式; 言语区域 3 的成员意识到地区言语变体, 他们没有意识到标准语言变体, 在语言使用中使用更为宽泛的语言变体形式; 言语区域 4 意识到语言标准变体, 在语言使用上不愿意使用地方语言变体。

3 埃克特和麦康奈尔-吉内的实践社区理论

为了更清楚地阐释社会实践和个体在言语集团中的能动机制, 拉维(Jean Lave)和韦格(Etrenne Weger)提出“实践社区”(community of parctice)这个概念, 实践社区强调社会实践, 而不仅仅将研究放在言语集团的人数或地点上。埃克特(1998)在研究性别语言与权力的关系时, 进一步阐述到“实践社区”是语言、权力、性别之场。她认为“实践集团”是人的组合, 人们彼此以普通的形式聚集在一起, 行事方式、交流方式、信仰、权力关系的总和即构成实践, 正是各种实践活动使人们彼此联系在一起。实践社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言语

社区, 实践社区不仅强调成员资格而且强调社会实践, 正是社区内部的实践和人们不同的参与活动构建了实践集团。强调实践社区的目的是将语言与性别的概括性的研究与具体的社会实践和话语实践相结合, 考察语言和性别如何构建实践集团, 从而研究语言、性别与权力的相互关系。具体的研究方法是将话语与性别置于某个特定的实践社区中去考察语言、性别及权力的相互关系, 采用“实地考察, 实际思考”的研究方法 (Think practically and look locally)。

四 结论

综上所述, 以拉波夫为代表的定量范式言语社区理论属于强调社会构建的言语社区理论, 该言语社区理论研究言语社区时倾向于研究社会对个人的构建作用, 其研究主体为言语社区里的群体, 认为社会机制先行存在, 过分强调社会机制对群体的建构作用, 研究强调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对言语社区成员之间语言交际的作用。

以海姆斯为代表的定性范式言语社区理论和勒伯热和塔布雷-凯勒的言语社区理论属于强调个人能动性的言语社区理论, 该言语社区理论认为在言语社区中个体起决定的作用, 正是个体的能动性决定了个人的身份, 忽略了社会机制对个体的规范作用。

以米尔罗伊夫妇为代表的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范式言语社区理论, 安娜和帕拉迪言语社区区域细分理论框架以及埃克特和麦康奈尔-吉内的实践社区理论的共同之处是, 既强调个人主体的能动性, 又强调社会机制的构建作用。他们的言语社区理论是对传统社会语言学语言变异学家和文化民俗学家的言语社区理论的有益补充。作者认为, 无论是强调社会机制的构建或是强调个体的能动性, 都有失偏颇, 在言语社区的研究中一定要既重视个体的能动性又重视社会机制对个体的建构作用。

参考文献

- Ana, O.S. and Parodi, C. 1998. Modeling the speech community: configuration and variable types in the Mexican Spanish setting. *Language in Society* 27: 23-51.
- Eckert, P. and McConnell-Ginet, S. 1998.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Where Language, Gender, and Power All Live. In Coates (ed.). *Language and Gender: A Reader*, pp. 355-367. Oxford: Blackwell.
- Hymes, D. 1972. Models of the interaction of language and social life. In J.J. Gumperz and D. Hymes (eds.) *Direc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Hymes, D. 1974. *Founda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Kerswill, P. 1993. Rural Dialect Speakers in an Urban Speech Community: the Role of Dialect Contact in Defining a Sociolinguistic Concep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3 (1): 33-56.
- Labov, William. 1966.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Arlington, VA: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 Labov, W. 1972a. *Language in the Inner Cit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Labov, W. 1972b.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Lave, J. and Wenger, E. 1991. *Situated Mea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 Page, R. and Tabouret-Keller, A. 1985. *Acts of Identity: Creole-based Approaches to Language and Ethnic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 Milroy, L. 1980. *Language and Social Network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lroy, L. and Milroy, J. 1991. *Authority in Language: Investigating Language Prescrip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 Romaine, S. (ed.) 1982a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in Speech Community*. London: Arnold.
- Romaine, S. 1982b What is a speech community? In Romaine (ed.). 8.
- Tabouret-Keller, A. 1997.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Coulmas, F. (ed.) , *The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 pp. 185-197. Oxford: Blackwell.
- Woolard, K. A. 1985.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ultural hegemony: toward an integration of sociolinguistic and social theor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2: 738-748.

A Review of Speech Community Theories

ZHANG Hongyan and ZHANG Maizeng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various theories on speech community. It analyzes the quantitative paradigm represented by Labov, the qualitative paradigm represented by Hymes, Le Page and Tabouret-Keller, and the complementary move of link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paradigms by the Milroys, Ana and Pardi. The paper also explores in detail the speech community typology proposed by Ana and Parodi and the community of practice proposed by Eckert and Mc-Connel-Ginet. The author holds that research on speech community should involve both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dividual and individual agency.

Key words speech community; practice of community; individual agency; social construction

(张红燕 湖北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外国语学院; 张迈曾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 姜开阳]